

日本汉学：文化转译与知识再生产的千年实践

马甜甜

西安外国语大学，陕西西安，710128；

摘要：“汉学”指的是国外学者对中国精神和物质文明认识的一个概括，严格地说，它包括了有关最广义的中国一切研究成果，一般认为是指对中国古代语言、思想、历史和文化的研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汉学逐渐成为国际上的一门显学，日本自隋唐起就开始引用中国的典籍制度，日本与中国汉学的渊源最为深远。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研究日本汉学，第一章主要介绍在不同时期中国的儒学对日本汉学的影响，汉文化、汉诗文的创作的范式转换。第二章主要介绍训读法的发明也就是汉文和读这一方法论革命推动了日本汉学本土化的演进。第三章主要介绍近代以来，在现代性语境下，日本汉学从特殊走向普遍，寻找新的地位。

关键词：日本汉学；文化转译；范式转换

DOI：10.64216/3080-1494.25.02.031

引言

当空海和尚在长安青龙寺获得密宗真传时，这位日本僧人或许未曾想到，他携归的不仅是佛教典籍，更开启了一个文明对汉文化持续千年的创造性转化。日本列岛对中华文明的接受史，不同于其他汉学谱系的单向移植，而是在“和魂汉才”的框架下，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转译机制。从奈良时期的“正仓院文书”到江户町人的“唐话学”，从明治汉学家的经世致用到当代京都学派的文献实证，日本汉学始终在“接受-解构-重构”的循环中，完成对汉文化的在地化重塑。

1 接受史中的范式转换

日本汉学的接受史经历了多次范式转换，反映了中日文化互动、日本社会变革以及学术思潮的演变。这些转换不仅是学术方法论的革新，也折射出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崇拜、批判到独立建构的复杂心态。

平安贵族的汉诗文创作，展现出“脱政治化”的审美转向。当时汉字和儒家经典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成为贵族阶层和僧侣的知识工具。菅原道真《管家文萃》将白居易诗歌转化为风雅游戏，宫廷诗会演变为和汉交融的美学实验。五山禅僧的汉学研究突破宗教边界，中岩圆月《中正子》以朱子学重构佛教义理，形成“儒佛互补”的知识范式。这种早期接受史中的创造性误读，奠定了日本汉学“实用理性”的基调。平安后期“国风文化”兴起，汉学地位相对下降，但仍是知识阶层的必

修内容。

江户时代的时候，朱子学成为德川幕府官学，但儒学内部流派分化，同时日本国学兴起。江户古学派颠覆了朱子学的正统地位，伊藤仁斋《论语古义》通过训诂考据还原经典本义，获生徂徕提出“古文辞学”，主张从先秦典籍直接获取圣人之道。这种学术转向与町人文化的勃发形成共振，冈岛冠山《唐话纂要》将白话小说纳入研究范畴，汉学从儒学经典向市井文化扩散。宽政异学之禁背后的思想统制，反证了汉学阐释权的政治敏感性。汉学从“绝对权威”变为被批判对象，日本开始建构独立的文化认同。

明治维新后，日本转向西方近代学术体系，汉学面临危机与转型。明治汉学家在“脱亚入欧”浪潮中重构学术身份，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论”，为东洋史学科奠基；狩野直喜创建“京都实证学派”，将清代考据学与兰克史学结合。这种学术转型使日本汉学率先完成近代学科建制，东京大学“支那哲学”课程设置标志着知识生产的体系化。汉学从传统经学转向现代学术，但被纳入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工具。

日本战败后反思殖民历史，汉学回归学术本位，同时受国际汉学的影响。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的东京学派（如丸山真男）与京都学派（如宫崎市定）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展开辩论。竹内实、沟口雄三等学者突破“中国中心论”，关注东亚整体互动（如“亚洲视角”）。子

安宣邦等后现代学者解构”汉学“概念本身，反思其背后的权力话语。这一时期，从“中国研究”转向“东亚研究”，强调多元文化对话与自我反思。

日本汉学的范式转换史，本质上是日本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不断重构自身文化身份的过程。这一历史不仅关乎学术方法，更映射出东亚文明圈的复杂互动。

2 方法论的本土化演进

日本汉学方法论的本土化演进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它涉及了汉字在日本的传播、变迁以及本土化等多个方面。首先，在公元 5 世纪左右，汉字传入日本，开始作为一种书写系统在日本流行，被广泛应用于历史、文学、宗教等领域的记录。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在使用汉字的过程中，逐渐对其形态和意义进行了改造和规定，使其逐渐具有了日本特色。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日本民族对汉字的吸收和消化能力，也展现了其独特的文化创造力和智慧。

训读法的发明是日本汉学最根本的方法论革命。这种“汉文和读”技术使汉语文献转化为可发声的“准日语文本”，《文选》训读本中的返点符号系统，创造出独特的“视觉-听觉”双重解读空间。林罗山《论语谚解》用假名注释汉文，使儒学教义渗透庶民阶层，形成“汉文文化圈”的底层传播网络。

和刻本现象体现文献研究的在地化特征。室町时代“五山版”汉籍校勘严谨度超越中土原本，江户和刻《十三经注疏》加入日本学者的“头书”批注，形成层累的阐释传统。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利用足利学校藏本进行校勘，其成果被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吸收，反向影响中国经学研究。

近代实证主义催生出独特的研究范式。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引入民俗学方法，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运用制度史视角，吉川幸次郎的杜甫研究融入文艺社会学维度。这种跨学科方法使京都学派在二战前已形成成熟的“文献-文物-田野”三重证据法”。

总的来说，日本汉学方法论的本土化演进是一个不断吸收、消化、创新和发展的过程。它体现了日本民族对汉文化的深厚情感和独特理解，也展示了其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保持文化独立性和创造力的能力。未来，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加深和扩大，日本汉学方法

论将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为中日文化的相互理解和交流做出更大的贡献。

3 现代性语境下的知识生产

明治时期的“脱亚入欧”政策导致传统汉学受到冲击，研究重心从儒学经世致用之学转向文学分析与文化批判。汉学逐渐脱离政治实用主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术领域，研究方法吸收西方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形成现代学术范式。例如，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批判儒学君臣伦理，推动思想解放，同时引入社会契约论等西方理论，重构知识体系。二战期间“东亚协同比”论调扭曲了汉学学术，津田左右吉《道家思想研究》被迫服务于皇国史观，折射出学术与政治的复杂纠葛。战后竹内好《现代中国论》通过鲁迅研究重建批判性汉学传统，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主张跳出西方中心论，这些反思推动日本汉学走向方法论自觉。

当代日本汉学在细分领域持续突破。池田知久《郭店楚简研究》展现出出土文献研究优势，小南一郎《西王母与七夕传承》打通文学与神话学研究，大木康对冯梦龙的研究揭示晚明出版文化。这种微观实证研究延续了京都学派的学术基因，在数字化时代通过“汉籍数据库”等工具获得新突破。夏目漱石与正冈子规的汉诗文创作被置于现代性视野下考察，其作品融合中国古典意境与日本近代情感，形成“汉意”与“汉形”交织的审美品格。这种创作实践既是对传统的继承，亦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回应，反映日本文化在“西洋化”与“中国化”张力的自我定位。

在东亚知识共同体重构的背景下，日本汉学面临范式创新挑战。渡边浩《东亚的王权与思想》尝试区域比较研究，丸桥充拓“唐宋变革论”的再检讨引发国际学界论战，这些动向显示日本汉学正从特殊走向普遍，在文明对话中寻找新定位。

4 小结

从正仓院的唐代乐谱到东洋文库的敦煌文献，日本汉学始终扮演着文化中转站的角色。或许对于西方来说，由汉学到中国学只是新旧称谓的变化，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变化的。但对于日本人来讲，汉学和中国学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日本汉学经历了“汉学——支那学——中国学”的历史变迁，而这种变迁既折射着中日两国的关

系史,同时也包含着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态度以及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变化。种独特的学术传统证明,文明接受不仅是简单的移植复制,更是通过持续的知识再生产实现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当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将《大日本史料》数字化时,千年汉学传统正在新技术中寻找存续之道。在全球化遭遇文明冲突的今天,日本汉学提供的“第三种视角”,或许能为超越中西二元对立提供历史经验,见证文化转译如何催生新的文明形态。

参考文献

- [1]王纪澎. 中国文化在日本[J]. 国际汉学, 2024, (06): 108.
- [2]黄婕. 对日本汉学的旁观与思考[J]. 世界文化, 2024, (07): 4-9.
- [3]张晓霏. 日本语境中的汉学[J].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23, (03)
- [4]张士杰. 日本汉学家“他者化”中国的路向与逻辑——以津田左右吉、内藤湖南、服部宇之吉为例[J]. 孔子研究, 2022, (05): 111-120+159.
- [5]郭墨寒. 冲正修编纂《支那地志略》研究[J]. 国际汉学, 2017, (03)
- [6]王梦如. 近代日本汉学研究的思考[J]. 才智, 2016, (24): 209-210.
- [7]赵志群. 近代“日本中国学”与日本侵华战争[D]. 福建师范大学, 2009.
- [8]钱婉约. 当代日本汉学研究的启示[J]. 中国图书评论, 2008, (04)
- [9]赵薇. 东洋史学与日本汉学关系概述[J]. 国际汉学, 2023, (02)
- [10]张如意, 马振秋. 从“自我”到“他者”——浅谈日本汉学的历史变迁[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4, 36 (04): 49-52.